學術討論

婦女研究對社會學的影響

王雅各*

婦女與兩性研究大體上是一個相當晚近出現的學術研究領域，這領域的提出和發展是伴隨著各方面參與婦女解放運動人數的增加以及整個社會上普遍的在女性意識上揚昇之後所造成的一個幾乎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婦女研究① 替社會、人文科學界所帶來的主要貢獻，在於它提出一個與從前任何方案都不相同的一個嶄新的看法。而這個不同就是指針對現有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加以批判。這篇論文試著從美國在本世紀後半部所經歷的有關婦女現象的全面演變開始論述。由婦女運動的發生到闡釋大規模婦女的動員對美國社會（尤其是學術界）所產生的影響；伴隨著婦女研究本身方法論特點的介紹。最後則對於此一獨特論述方式的提出可能對社會學所造成的影響加以評估。作者也企圖在分析的過程中帶出在美國本世紀社會學理論發展中一直都與婦女動員的階段、策略、目標和特質有密切

* 中興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① 婦女研究可以被視為是一個社會人文科學界，包括在台灣的經驗而言，所創造出來的新研究領域。它所試圖展現的是用一種從女性本身出發的角度來觀察問題、研究現象、制定計畫、詮釋資料和賦予意義的過程。簡單的說，婦女研究所試圖達到的目標是提供一個有別於在傳統上用男性為主對世界看法的替代性選擇。本文將以婦女研究、兩性研究、婦女與兩性研究、女性學等通稱之。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4期（1996年8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關聯。②

研究婦運的學者多半同意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婦女解放的確是一個全球的現象，譬如在 Katzinstein 和Mueller 的研究中她們認為因為婦女解放運動具有一個「轉換的特質」、一個「重新構建教育、工作場所、家庭和公眾生活的希望」(1987: 5)，使得全球表現「一個」婦女政治動員。雖然在這個全球情境中的動員有著不同國家、政體、社會和意識型態上的差異（甚至同一國家中的婦女解放亦有著種族、文化、階級和性偏好上的不同取向），但是由於她們對一個「改善婦女在社會中地位的共同關懷」(Ferree, 1987: 173)，卻是使得人們承認婦女的政治動員有著它重要的共同性。即使如此，以美國婦女解放的經驗為探討的基礎事實上也有著許多值得爭議的要點。 Margolis (1993: 379–99) 指出唯有少數的研究將婦女運動放在國際的脈絡中 (p. 380, 註 2, 3)。③ 雖然 Margolis 並不認為婦女解放運動是一個西方社會所獨有的現象，但她卻中肯的指出了英語或可以在美國找到的婦女政治動員文獻所探究的確實比其他的論述要週全；甚至以英語所發表的其他（指在北美、西歐之外）婦運文獻也多集中在參政婦女或婦女地位的一般性介紹之上 (Pharr, 1981;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Chou, Clark and Clark, 1990)。

對於非第一世界的婦女動員的忽視和邊陲性在最近的學術研究中部份地得到了矯正。研究西方社會的學者雖然依舊用美國婦運做一個測量的表尺 (Kaufmann-McCall, 1983: 282–93; Gelb, 1987: 286)，但她們的語氣已然是批判多於讚揚了。然而更重要的發展是一群關心第三世界的學者以自己本土的經驗來做美國婦運經驗的反證 (Katzinstein, 1989: 68–9; Kishwar,

---

② 若非婦女與兩性研究影響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在某種範圍之內是可以成立的），我們至少可以認為兩者存在著一種互動和相互影響的關係。本文之所以選擇美國所發生和婦女相關的現象作為探討的重心，其主要原因是：不論在社會學或婦女與兩性研究，美國都執世界之牛耳。當地所經歷的實務和理論發展對世界其他地區都有實質和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本地的婦女研究發展過程中就有許多學院和運動工作者在美國受訓練或有過在當地生活的經驗。因此，即使我們注重科學的本土化，美國的經驗亦是此項努力中一個相當有意義並且值得探討的因素。

③ 學者 Palley (1991: 163–78) 和 Peters and Wolper (1995) 亦有以「將女權視為人權」省視的國際性研究。

1994: 22–9; Bhavnani and Coulson, 1994: 334–44)。在主流的美國婦運被普遍抨擊為「專注在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取向」的情況下，晚近的國際婦女集會已然發出「尊重不同（看法、組織型態、階級、議題、種族、性偏好、優先順序……）婦女」的呼聲。而對於一個包容的異質性姊妹情誼 (sisterhood) 的要求也甚囂塵上而成為世界婦運的共同目標了。

雖然基於許多原因使得學者在研究婦運的時候通常只能夠專注在一個國家的情境中。但即使資源有限，學者依舊可以在全球不同地區的婦女動員中找出跨文化的比較因素和基礎。根據 Margolis 的結論 (1993: 396) 研究婦女運動若能關注到：

①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婦女動員的規模較大；

②婦女若大量就業以及普遍有和男性相當的教育程度則傾向在運動中有激進的意識型態；

③婦女動員的組織型態對應於當地的政治結構；

④法律中的性別平等條文有削弱婦女政治動員的作用，在這類社會中女性因無明顯抗爭對象而必須訴諸想像中的盟友；④

⑤有外國影響的地區不論是否曾有被殖民遭遇或社會傳統父權極為強勢的社會亦有減弱婦女解放運動組織自主性的效果；

⑥官方組織會對自發的婦運組織有刺激作用，但前者無法提出當地引起爭論的論題。

則對於整體的婦女運動有莫大的裨益。因為在全球的經驗中婦女解放運動和婦女與兩性研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⑤ 所以探討婦女運動也就是間接地在深究婦女學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世界婦運研究者不論是否贊同美國版婦運的進行方式，但她們都必須對美國的婦女解放有基礎性的理解。雖然強調美國經驗可能會使人產生一個「全球的婦女政治動員或多或少都像美國婦

④ 我國的經驗與此矛盾。雖然憲法明文保障兩性的平等，但在日常生活中並未落實；也因此國內婦運團體的眾多修法要求即是針對此而發。

⑤ 在許多社會的婦女解放運動中，婦女研究中心成為政治動員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婦女研究中心透過與其連結的各種行動網絡在學術和社會運動中發揮極大的力量（亦見 Wartenberg, 1986）。我國的情形亦不例外。

運」的錯覺；但以事實而言，美國婦運的確對全球婦運產生相當的影響。而世界婦女的政治動員的確有許多共同（相通）的關懷和訴求，因此本文之所以專注在美國婦女的政治動員的理由 (rationale) 是旨在藉著審視美國經驗以尋找一個幫助建立本土婦運的契機。進一步而言，婦女與兩性研究是一個「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泛科技整合 (transdisciplinery) 領域，不同取向、地域、學門、和人的研究，事實上也有助於此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終極而言，本研究試著從三個重要問題的探討來看婦女和兩性研究的性質。這三個問題是：

第一、在何種歷史和社會的脈絡下興起了婦女研究，而婦女研究又如何改造社會？

第二、婦女研究對社會學整體而言有何影響？（此影響當然包括理論的建構和各次領域中的經驗的探討。）

第三、婦女研究的方法論有何特色，以及它對社會學中的次領域造成何種衝擊？

婦女動員對美國社會的衝擊

一九六〇年代的世界，尤其是以美國來講，可以說是一個有密集運動風潮的年代。流行在當時的黑人民權、反越戰和大學改革等三大運動不僅在相當範圍之內改變了一般美國人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但更有意義的是在許多的社會運動中有極大量的女性（尤其是大學和高中學生）參與。這些參與不同運動的女性在她們的參與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宣稱自己是平等、自由、和以人性尊嚴為取向的男性，並且發現了這些男性事實上是和沒有參與運動的男性一樣的沙文主義。在體認了這個事實之後，有些女性運動者從各種運動中走出來，並嘗試成立一個獨立以追求性別平等為目標的運動。在以上的過程中，婦女運動員在許多生活領域和奮鬥過程裡發現了她們所處的境域類似其他弱勢族群 —— 有色人種、罪犯、原住民或同性戀等等 —— 並且更糟。因為她們還會遇到性別歧視，所以在與一般的弱勢

團體結盟奮鬥的過程中，有些女權主義者也發現了其實社會不平等並非單一向度的根據一個指標（如性別）來分類。有些族群，譬如說黑人、同性戀者就是會受到雙重危害 (double bind, double jeopardy) 的特殊團體。

身為女性，使得「女性經驗」被視為是婦女所遭受性別不平等的一個反映。從一個獨立運動的提出，在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事實上對該社會在當時的變遷產生了立即和直接的影響。以社會運動而言；從新左派 (the New Left) 爭權中女性的出走，並企圖建立一個以解放女性為目標的運動 (Wang, 1992: 23–6)，到婦女動員和同性戀權益努力的興起、環保意識和組織的抬頭、原住民問題的再次受到重視等現象，都說明了婦女解放運動與美國社會的密切關係。

在前面所敘述的動員過程中我們或許會很直覺地認為：「如此看來，婦女解放運動的確和美國社會脈動有關係，但這個關係不是在二戰結束之後才有的嗎？」或者質疑「婦女解放運動和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又有什麼相干呢？」但是在深入地探討之後，我們發現事實上對以上兩個問題，婦女和兩性研究所展示出來的是一個具體而又複雜的答案。以第一個問題為例，其實現代婦女的動員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在美國產生，在那個時候一部分的婦女著力於黑人和白人種族關係的改變。而絕大部分的婦運努力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普遍性投票權和婦女接受大學教育權利的爭取。

我們理解社會學在美國的成立大體上也是在十九世紀的末期。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的轉折點，由一群在芝加哥大學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在艱鉅的奠基工程後，使得社會學漸漸地在學術界被人接受。也因此，所謂的芝加哥學派社會學成了美國社會學的第一個主要典範；並且在一九四〇年代之前獨霸了美國的社會學界達半個世紀之久。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對美國社會最大的貢獻，根據鮑默爾 (1984: 1–12) 的說法是它不僅合法化了社會學的科學性地位，同時也經由許多芝加哥學者的努力使的社會學成了一門紮根在經驗性研究的實證科學。而早期的學者在試圖把社會學建立成一門科學的過程裡也觸及了與婦女有關的各種議題。在這其中特別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湯瑪斯 (W. I. Thomas)。除了在民俗心理學、民族誌、人格心理學和種族問題有許多論述之外，湯瑪斯亦是少數在二十世紀初期對

婦女和兩性關係做過研究的學者。⑥ 湯瑪斯被鮑默爾認為是和派克 (R. E. Park) 並列於對芝加哥社會學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者 (1984: 2)。而且在一般人對芝加哥學派或湯瑪斯本人學說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對於女性和少數民族的關心相當程度影響了派克和湯瑪斯的學術研究歷程。

從帕森斯在 1937 年出版了《社會行動的結構》之後，美國社會學漸漸地轉換到以結構－功能為主要取向的理論典範中。帕森斯理論的興起一方面說明了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社會學在美國發展了半個世紀之後，美國本土的學者第一次試圖建立自己綜合性理論以及探討社會現象的架構。⑦ 但更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後，由於美國倖免於戰火的在其國內波及，和自由世界火藥庫角色的扮演，使得美國的工、商業得到空前的發展的機會。這使得美國得以在 1929 年的經濟大恐慌之後，進入了一個相當繁榮、安定、經濟高度發展、國勢強盛和社會情勢維持長期穩定（即：幾乎沒有社會變遷）的國家。事實上，與其說結構－功能理論的提出是帕森斯把自己關在哈佛大學的象牙塔內潛心於社會體系的建構，不如說是當時的美國社會使得一個封閉的學術環境成為可能。因此當學者批評結構－功能理論本身的強烈連續性 (Gerstein, 1976; Turner, 1982: 38–9) 和它的保守、靜態和反歷史等特性時，這些指控也可以是很貼切地被推論到是學者對當時美國社會所發出的批判。

總的來說，一般社會科學家都認為結構－功能學說是不足以解釋社會動學（變遷）的理論。而在剛才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其實是因為從四十到六十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激烈和明顯地變遷。因為這個原因，使得當時的美國社會學界把精力集中在階層化、工作、疏離、社會流動和偏差（犯罪）等以「從眾」、「融合」為取向的探討。在六十年代所發生的快速社

---

⑥ 湯氏的社會學博士論文集中在兩性生理上差異的探討，而此探討的興趣延伸到他在 1907 年所出版的《性與社會：社會心理學中關於性的研究》書中並轉撰成為社會因素中的兩性差異。此外，《適應不良的女孩》和《波蘭農夫》中，湯瑪斯亦對女性和男性的互動和關係有深入的探討。

⑦ 社會學在孔德提出了學科的名稱之後，由涂爾幹首先在法國放進了大學的科目。經過許多創始人（亦包括像是馬克思、韋伯等）的努力之後而形成了一個學科；一般來說，我們認為社會學發源於歐洲（尤其是法國）。

會變遷使得美國的社會學開始注意到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而弱勢族群（諸如有色人種、同性戀人士、原住民、婦女等）在主流意識型態中的不利境遇，以及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成了衝突理論的主要討論基礎。事實上美國的社會學之所以從保守、靜態的結構－功能轉變到激進、動態的衝突典範多少也證明了「物極必反」的道理。在這其中最明顯地也就是女性主義者在挑戰父權意識型態中所遭遇的一連串挑戰－回應的過程中，不僅迫使美國社會展現了兩性關係的不同風貌，更在個人意識的層面上，徹底改變了從事社會運動的所有成員。

同時在六十年代末期，因為女權主義者的作為使得學者開始再次注意到行動和意義的問題。基於女性主義者所帶來的「不同聲音」；⑧ 使得學者也逐漸地把注意力推展到其他的弱勢族群，而這現象的整體性結果卻又使得在社會學理論中強調情境、詮釋等的互動社會學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新意義。就這一點而言，婦女研究對於美國學界的貢獻是藉著婦女的努力，促使主流的研究人員也注意到了所有弱勢族群的「不同聲音」。最有趣的是除了古典的現象學和形象互動論的復興之外，我們也在六十年代末期看到俗民方法論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⑨

後現代主義很簡單的說就是「從啟蒙運動之後的西方主要思想像是直線進化、理性，人類在文化和文明上的進展可以無窮盡；科技終將掃平一切的壓制和迫害以解放所有不同族群的人，使社會進入真正的平等」的這個看法面臨了極大的挑戰。在蓬勃的後現代文獻中 (Huyssen, 1986;

---

⑧ 女性主義者 Carol Gilligan 在 1982 年所出版的經典之作《一個不同的聲音：心理學理論和女性的發展》(In A Different Voice :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深刻地提出了這個「不同聲音」並對之加以分析（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⑨ 浮面看俗民方法論和後現代主義都是對女性主義產生重大影響的學說，特別是學界普遍地把後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相提並論。深一層看來在東西學者一致地面向法國追根溯源的探討後現代主義的今天，學者其實都忽略了俗民方法論也對後現代主義有重大的影響。這個影響可以合理地被稱之為「後現代主義在美洲的淵源」（這個論點是沈幼蓀在和我的一次討論中被提及，我現在還在思考這一個影響，因此無法深入討論；但在一個很直覺的反應上我認為這個論點是很吸引人的，在此我要感謝沈幼蓀給我的靈感和建議。）當然這些討論只是事實的一半，另一半則是與本文有關的女性主義亦對俗民方法論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Lyotard, 1986; Baudrillard, 1987: 3; Harvey, 1989)，女性主義也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批判。有些沿襲後現代主義的女性學者認為女性主義可以豐富並強化後現代主義 (Flax, 1990: 48; Nicholson, 1990; Haraway, 1991; Braidotti, 1992)；但有更多的女性主義者 (Fraser, 1989, 1992: 51–71; Weisstein, 1993: 242–244; Faith, 1994: 36–60; Soper, 1994: 10–21)，則認為後現代主義根本是一個退化的新保守主義而加以猛烈的抨擊。

具體而言，在美國的六十年代是族群、運動、思潮、和社會學理論的「百花齊放」時期。而尤其是社會學理論在歷經了芝加哥、結構－功能、衝突、和互動的典範轉換之後，替最晚近的解構主義⑩ 奠定了萌芽的契機。因此在我們看到解構主義成為一種對「現在」生活的總體批判方式時，女性主義也溶入了她對人類社會的批判。這個批判是針對父權社會中男尊女卑的兩性關係的挑戰——其實也造成了知識典範的轉換。接下來我們就討論婦女和兩性研究對社會學所造成的衝擊。

婦女研究對社會學理論的影響

婦女研究最獨到之處在於它涵蓋了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的領域，由這點來講兩性研究有著它實質和形象上的特色。以前者而言，婦女和兩性研究並不像一般的學科專注在一個領域的探討；但同時婦女研究也和一般的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ery) 的專業如都市計畫或區域研究不同。事實上，我們可以在從像是空間的分配使用、語言的意義到工作場所的區隔化中等等，看到女性學的蹤跡。至於在形象的意義上，因為婦女研究打破了所有科系的藩籬，使得它成為了具有最大包容性探討領域。這一方面打破了具有男性意味的「專業」、「分工」等科學的構建理念和方法；同時對於非理性認知重要性的主張（如：情緒社會學），也都象徵了一種迥異於傳統視野的提出。

女性主義者 Kanter 和 Millman 在 1975 年的研究中提出了有關婦女和

⑩ 作者在本文中不擬討論解構、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的差異，而將三者視為等同。

兩性研究對傳統社會學的六個批判，包括了：

①社會學家一向研究傳統主題，忽視婦女生活現象的瞭解與問題的研究。

②社會學往往注意公共領域 (the public sphere) 之身份和行為，漠視婦女生活領域上的體驗。

③社會學有偏重描述社會是一個單元普遍性之個體的趨向。

④社會學者很少認為性別是一個主要影響行為的因素。

⑤社會學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免不了帶有保守之觀點。

⑥傳統社會學之研究方法，只能幫助某種資料的收集，未能去發掘新的資料。

因此，婦女研究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針對一般社會和人文科學中的男性霸權做根本的批判和挑戰。

我們可以從以女性為對象的研究 (research on women) 和為了增進女性福祉的研究 (research for women) 兩方面來看婦女研究的理論特色。傳統的科學研究多半標榜其「客觀」、「中立」、「無價值」的特性而強調其知識性和學術性。女性主義的研究者不僅不認為「知識」是客觀的；她們更指出了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特別是）男性偏見和其他立場（種族、年齡、階級、性偏好等）。也因此女性主義者亦會明確地標示其立場並鼓吹 (advocate) 研究所具有的政策意涵。⑪ 以此來說並非單純地以女性為對象的研究就是婦女研究，而兩性研究也絕非女性學者的專利。其關鍵點是在於一個「女性意識」 (feminist consciousness)。

具有女性意識的探討可以針對傳統研究中的男性偏見加以挑戰和駁斥，並提出以女性經驗為主的研究主題或對於一般性的研究賦予一個「女性的」意義。舉例說：傳統觀念否認女性有性的需要，因此在夫婦間就無所

---

⑪ 學者在論及女性主義時常將個人政治 (personal politics)，或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相提並論。前者係由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口號「個人的即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延伸而來；後者則被不同的弱勢族群（特別是同性戀）借用：意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表現在不同族群的身份（或地位）上，且必須以政治力才能打破不平等。

謂強暴的問題。⑫ 或者研究暴力的學者有把焦點放在國與國之間的衝突（戰爭）、不同族群的緊張關係展現（暴眾和暴動）、某些偏差行為（暴力犯罪）而鮮少把毆妻視為是暴力行為並加以調查的。相反地，最近幾個相當顯著的婦女殺死加害者的事件中我們卻目擊了施／受虐者若角色對調則殺人的結果完全不同。心理學界和法律學界利用一個症狀名稱「被毆婦女症候群」(Battered Woman's Syndrome, Walker, 1984)，來替這些婦女開脫罪行。藉著把這些婦女的行為病理化，而不是去批判被虐婦女所處的情境，表面上看來替被虐婦女找到了一個法律保障的藉口和施行醫療的切入點，但對於將被毆婦女逐步被迫入採取殺人行動的環境卻一無改變。這其中當然牽涉了政策（如強暴、自衛殺人、和謀殺等）制定和執行人當中對法律和性別的刻板印象了。

在上面所舉的例子當中，我們看到的傳統理論的盲點是一方面社會科學家把女性視為是一個沒有主體性、消極、次要的性客體；而另方面研究者則把社會生活劃分為清楚對立的「公」、「私」兩個領域，並且認為在家中 (domestic) 所發生的事並不值得認真地探討（因此家庭暴力不存在或不重要）。有女性意識的婦女研究就有能力指出這種反女性意識型態的缺失。婦女研究的意圖在指稱缺失、陳述事實上只是對傳統理論挑戰的第一步。更有意義的是，它還會在它探討的過程中特別去凸顯婦女受壓迫的經驗，以及造成這種壓迫的社會過程。換句話說，有女性意識中心議題的兩性研究也試圖尋找出除了描繪女性所受到的歧視之外，造成性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這種在尋找不平等根源上的努力，使得婦女與兩性研究進入了為增進婦女福祉的研究 (research for women) 的範疇。事實上不論在指陳缺失或尋求原因上量化和質化研究都是並行不悖的。因此，如果對勞動市場的參與有興趣，我們可以由統計、數據分析的數學模型著手（量化研究）。同時也可以探討身為家庭主婦而無法進入就業市場的婦女在自我評價 (self-esteem) 上與賺取工資的受僱者 (gainfully employed) 的婦女有何

⑫ 因為既然女人沒有性慾且男人性慾極強，女人的參與「性」只是為了滿足男人的需要。在這當中，先生只要性慾來了太太就必須配合，無所謂「不同意」性行為，因此在夫婦之間也就不存在強暴的問題。

差別（計質研究）。在這個例子中，不論我們採取那一種研究法，只要我們體認並指出了女性和男性在家務分工上的不合理性，⑬ 那麼我們的研究就是「有女性意識」的。

在指陳缺失上，婦女與兩性研究並不是單純地只從個人層面探討⑭ 來解釋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反而是在找出了歧視原因之後更進一步地推進到批判並檢討孕育這些原因的結構、組織和意識型態，並且在批判的過程中使得任何父權意識得以著力的說法都失去基礎。由此赤裸裸的呈現了由表面上看來的個別現象都在最終的分析裏被歸結到一個男尊女卑的意識型態上。婦女與兩性研究並不以指認出性別不平等和挖掘出其原因為滿足。婦女研究的第三個特點也在於提供一些可以改善現狀的建議。以這一點而言，婦女學的發軔其實和計質研究相當類似；因為兩者都以對弱勢族群的關心開始且研究者試圖參與被研究者的生活，並且從後者的角度來看世界——這和傳統研究中主張研究者的優位性是相當不同的。

校正傳統研究中的性別偏見、凸顯婦女受壓迫的本質和找出其真正的原因是婦女和兩性研究中「非常的破壞」的部分。同樣重要的是兩性研究也必須指出有利於兩性平等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和文化環境。這可以被視為是「非常的建設」的部分。基於這個原因，婦女研究有其明確的政策意涵。由於它和社會政策的高度相關性，使得婦女和兩性研究成為一個理論和實務密切結合的領域。

在一般學術探究的過程裏，雖然研究者都瞭解理論和實務結合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兩者卻在許多事例裏脫節，造成了行外人 (laypeople) 對學者的誤解、無知和嘲諷。婦女研究因為本來就著眼在實際社會情境的改變

---

⑬ 家務 (housework) 的從事並不被學者認為是一種職業。事實上我們也從未聽說家庭主婦因從事自己的家務工作而得到金錢上的酬勞，由於家務普遍地被視為是一個「無給職」的工作，因此它並沒有引起學者的重視，而「工作社會學」這一個重要領域也沒有把家務本身當成是一個研究的主題。一般的情形是即使夫婦都有工作，但妻子總是分擔了大部分的家務。

⑭ 以貧窮研究為例，有些學者就以人力資本理論的角度為例來辯稱婦女之所以在勞動市場受到差別待遇，主要在於她們具備了較差的條件，如教育程度低落、工作意願不強、能力差、不願通勤、或因生育而中斷工作等等原因來作解釋。至少一部分的貧窮婦女化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學者有這種意識型態。

上，因此它對研究成果在現實上的適用性有更高的要求。更進一步來說，透過方案設計和方案評估等過程，使得婦女研究的成果可以被重複、互動和辯證式的使用在實際生活的改善上。由於婦女和兩性關係研究的學者從不否認她們的價值觀、立場、和研究的目標，這使得婦女學成了一門和日常生活最適切 (relevant) 的探討取向。

除了在實際生活上有著政策的意涵之外，婦女與兩性研究也對尋常知識的根本意義上產生質疑。在最終極的層次上來說，像是語言、文字等符碼都會被學者在男尊女卑的意識上加以抨擊挑戰。譬如，以前在論及人格發展的過程中——至少在古典的精神分析術裡——完全沒有女性，而在醫療社會學中的心理健康也多不提及身為女性的經驗。另外在前面所提到的公、私領域的對立，使學者在討論到像是經濟發展或福利政策時，讓婦女在家務工作中的貢獻甚至連殘餘的地位都沒有。以此來看，婦女研究的努力甚至會使我們去質疑像是暴力、經濟發展、家庭、或者歷史⑮ 等這些概念的基本意涵。因此婦女與兩性研究有著校正傳統研究中的男性偏見、凸顯女性受壓迫的事實，探尋這個壓迫的本質並且找出其原因，具體地提出改善社會情境使其較有利於性別平等的功用。

總而言之，婦女與兩性研究以它涵蓋面(scope) 的寬廣度而言，遠超過一門學科。更重要的是它的特色包括了打破傳統科系藩籬、注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強調主觀性、立場和對政策的相關性以及對於弱勢族群的特別關照都使得它和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學科」不同。就此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婦女和兩性研究這個探討領域和一般社會、人文科學的學門極為不同。這個不同部分地展現在它所採取方法論的態度上。這也是我們在下一節所要進入的主題。

婦女研究方法論的特色

長久以來，是否有一獨特的女性研究法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相關的學

⑮ 經過了有女性意識歷史學者的提醒之後，許多人都已熟知在英文中的「歷史」指的是「男人的故事」了。

者；基於研究法是構成任何一個學門所不可或缺的基礎，因而對於婦女研究所採行的方法論也是本文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在民國七十八年由周顏玲所提出的文章中 (1989: 11)，她區分了認為婦女研究方法論是獨特的和與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法並無不同的兩種派別。本文作者則認為與研究法相關的討論，其實有三個層次：方法、方法學和認識論。以第一個層次而言，方法 (methods) 所代表的是收集資料的「技術」 (skills, techniques)。在此層次之上女性主義的學者和一般的社會、人文科學家是完全一樣的。換句話說，對於任何一個研究對象，我們只有有限的「技術」去收集相關的資料。它粗略的包含了問卷、普查、量表、模型分析、田野工作、訪談、參與觀察、種族誌、內容分析、生命史等。因此例如對於一個家務分工的議題我們可以選擇問卷、量表、深度訪談或以上三者來進行研究。

在第二個和方法有關層次上的討論應該是方法學 (methodology)。所謂方法學指的是對於不同研究主題特徵的分類以及根據此類目所製定出來的研究策略 (strategy) 和採用特定收集資料技術的理由 (rationale)。在這個層次上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是婦女研究和其他學科有異有同。就異的方面來說，許多女性學者偏好質的研究法，也因此學界喜歡將女性研究與質化研究相提並論。然而並非所有（或甚至大部分）的女性主義者都是使用計質研究來探討社會現象，也不是女性學的議題只能用質化研究來做。因此在討論女性主義研究法獨特性的議題時多半是研究策略和理由的考量和差異了。同樣在此層次上的方法論探討，有些學者認為婦女研究是一個和現有以男性為尊知識論對立的學科，也因此婦女和兩性研究是一個以質化研究為主而不同於量化研究的知識構建企圖。不可否認的傳統的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多隱藏著以男性為中心的偏見；因此有些女權主義者認為為了反抗以量化為主的男性理論構建法則必須採取以計質研究為主的研究法。但也有些女權主義者認為過分地強調質化研究將來亦有可能使得女性學成為另一個僵化的「典範」。⑯

⑯ 典範一詞的意涵有許多，《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孔恩提出了二十多種的定義（亦見 Ritzer, 1975）。此處所稱之典範，其主要意義是指在一個人學習過程中在一定理論架構指引下必須經歷的所有訓練，而文中所說的「一定理論架構」是指「實證主義」。

做為一個有獨特研究方法的探討領域，婦女和兩性研究最大特色，其實是在第三個最抽象的層次——認識論 (epistemology) 上。具體的說，婦女學所建議的是一個具有「女性意識」的研究法；它根植在個人的生活經驗上，並且以一個「身為女性」的立場來觀看世界。舉例而言，在論及婦女和歷史的關係時，有女性意識的學者早就發現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建構和理解充斥在學科之中。而在企圖顛覆這種以男人為主體的論述氣氛和情境時，長期以來女人的不可見性卻使得「在歷史中『發現』女人」的工程極端困難。「女人有歷史嗎？」(Duby and Perrot, 1992: ix)、「歷史學多忽視女性！」(Lerner, 1979: 3) 和「女人總是生活在歷史的陰影中」(Braudel, 1981: 272) 是我們經常會聽到的說詞。然而有女性意識的學者總能夠在傳統層級性性別秩序建構的邏輯中運用生活世界的觀點找出女人的主體性。譬如在日常生活的活動中，眾多女人所一起從事的勞務也形成了一個「公領域」（提水、收割等）；而這個相對性別秩序建構的觀點，一方面打破了許多傳統攸關女性／男性的二分法觀點，⑰ 如性別空間和性別角色；另一方面有女性意識的婦女研究亦可以在眾多女人「現身」了之後進一步地設法建構「女人的歷史」。從這個角度來講，婦女和兩性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於即使她所採取的是一個尋常收集資料的技術，但在對於被研究議題自身為何要採取此一特定技術，研究結果的詮釋和研究的目的都和非女性主義的傳統科學研究截然不同。整體而言，我所採取的立場並不全然地等同於前述的兩種類型，因此可以被視為是一種不同見解的提出。⑱ 更具體的說，婦女與兩性研究事實上是企圖打破巨觀／微觀、量化／質化、實證／反實證這些二元對立看法的一種論述取向。因此在判斷一個研究是否為婦女研究時，我們並不是僅僅注意到研究者的性別或者她（他）所採取的研究法，反而是著重在該研究是否有以女性為中心的探討議題。

或許我們可以用兩個實際的例子來進一步說明女性學在方法論上的特色。第一個例子是由 Naomi Weisstein 1971 年所出版的文章《心理學建構

---

⑰ 亦見成令方，1993: 225–9 之相關討論。

⑱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 S. Reinharz (1992: 3–17) 的立場和本文相當接近。

的女性》。⑲ 本文的中心議題是「心理學完全無法提供任何東西給女人，不論是她們的喜好、需求、欲望或其他——因為很簡單的，心理學並不瞭解女人！」針對心理學狹隘地認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生物、本質）上的差異，Weisstein 舉出了許多生物、考古、和人類學上的例子來抨擊心理學對兩性之間的本質論 (essentialist) 的對兩性的看法。

Unger (1993: 212) 認為《心理學建構的女性》最大的貢獻在於 1. 若非研究者本來就已經知道研究對象的性別，則沒有證據可以支持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人格結構； 2.不論女性或男性都沒有在人格和行為之間的統整(consistent) 連結； 3.人的行為較多是自我和她人期許的結果，早期社會化和生理需求僅占極小的部分；心理學家用來建構和驗證理論的問題其實受性別歧視規範極大的影響。藉著指出心理學多半將重點放在個體以及行為的生理層面上，Weisstein 認為因為對於內在特質的注重而忽視外在的社會情境使得心理學對人所具有的可能性和人類行為的研究沒有任何實質的貢獻。更糟的是心理學成了一個放置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文化上性別角色的認識和理解的工具。性別角色不但限定了我們所稱的「女性本質」，它也使我們對異性戀產生一個正常性的認定；因此心理學成了一個維繫父權的社會組織和父權的意識型態的偽科學。

Weisstein 對社會情境的注重不但呼應了六十年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取向 (Berger and Luckmamn, 1967)，更重要的是她的努力促成了社會心理學原本由現實塑造個人的看法，轉移到個人建構現實的典範。這個典範的轉換完全夠格地被稱之為「科學的革命」(Kuhn, 1970)。事實上，心理學界的女性學者 Buss (1978: 57–64) 就是以「心理學革命」來稱呼 Weisstein 的作品。除此之外《心理學建構的女性》也是整個社會人文科學界在方法論

⑲ 本文全名是 Psychology Constructs the Female; or, The Fantasy Life of the Male Psychologist (with some Attention to the Fantasies of His Friend, the Male Biologist and Male Anthropologist)。它先是在 1968 年 10 月在伊利諾的 Lake Villa 對一群活躍的女性主義者發表；其後又在當年的 11 月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以 Kinder, Kuche, Kirche as Scientific Law: Psychology Constructs the Female 的名稱對美國研究協會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發表。New England Free Press 首先將講稿出版，此文後來又在不同場合發表多次最後修改完成的形式在 1971 年，登錄在 Journal of Social Education, 35: 362–73。請見 Weisstein, 1993: 244，同註②。

上轉移到所謂的後實證主義的、民族誌的、現象學的、主觀的、個案的、質化的、詮釋（hermeneutic）的、人文的、或者以 Lincoln 和 Guba 的說法「自然的」(1985: 7) 的一個里程碑。

Weisstein 的文章特別針對了六十年代主流心理學界在方法論上的缺失：男性心理學者執著在死板、僵化的實驗法、缺乏彈性、低標準的驗證、和最重要的無視於文化對他們所產生的影響以致於做出了不利女性的結論。⑳ 這個重要的貢獻也使得二十五年之後一個相當晚近的女性主義論述《女性主義與心理學》期刊提出一期的篇幅 (1993, vol. 3, no. 2) 來討論 Weisstein 的這篇經典之作。

整體而言，《心理學建構的女性》在保守的六十年代對保守的心理學界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它啟發了無數的女性主義者，定了心理學性別歧（忽）視的罪，廣泛地被女性學界引用。它也被 Kitzinger（1993: 189）描述成「對男人用來解釋和支持女人的被壓迫理由的心理學的一個經典的重要作品」(Tuttle, 1986) 和「吸引並激勵了所有的女性主義的心理學家」(Colwill, 1978)。特別是情境、意義、詮釋、構建等觀念回應了當時才剛剛興起的方法論取向。這其中的主觀性（亦有學者稱之為「立場」，Shotter, 1978: 33–43; Harding, 1986, 特別是第六章）就是另外一位女性學者 Dorothy E. Smith 的學術表記，她也是我們要介紹的第二個例子。

由美國社會學會 (ASA) 理論委員會所出版的半年刊《社會學理論》在 1992 年春天的一期裡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0, no. 1) 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辦了一個有關於 Dorothy E. Smith 社會學的研討會。首先由 Laslett 和 Thorne 對 Smith 的理論作一概括性的介紹；接著由 Lemert, Collins 和 Connell 針對 Smith 的三個主要作品作評論；最後則以 Smith 本人對評論的回應做總結。記憶中這份刊物有針對特定的議題作過專輯，但針對特定的一個女性的社會學者，好像還是第一次。那麼 Dorothy E. Smith 究竟是

---

⑳ 有學者認為 Weisstein 的批評方式非常實證主義，但 Gill (1993: 236–7) 卻將此歸咎於當時的學術風氣。換言之，Gill 認為當時所流行的後現代主義會對 Weisstein 有批判性的看法。這也是本文在稍前所提到的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互動的另一個例證。

何許人？她又有什麼樣（對社會學）的見解呢？

1963 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目前執教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教育研究學院。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她作了許多植基在女性主義的社會學研究：從伍爾芙 (Virginia Woolf) 的自殺到她以自身的經驗描述女性社會學者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上所遭遇的困境，她的社會學是有充分的深度和廣度的。 Smith 是一個堅定的女性主義者，雖然她研究的領域（精神病、日常生活、新聞學、社會學理論、民族誌、權力關係等等）寬廣的令人咋舌，但終極來說，她幾乎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試圖建立「如何把社會學研究發展成一個從女人立場所經驗的主題領域的社會學」 (Smith, 1990: 1)。

Lemert 認為Smith 的理論首要根據在馬克思和俗民方法論；其次是舒茲 (1992: 63)。但在明確的感謝 Mead, Merleau–Ponty, Marx 和 Garfinkel 影響的同時 Smith 自己則宣稱「我不是一個形象互動論者，也不是一個現象學的社會學家，更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又不是俗民方法論的學者，我所發展出來的社會學探討法並不屬於、也無法被任何解釋 (interpretative) 社會學的程序所能涵蓋」 (1987: 8–9)。依我的看法 Smith 所宣稱的其實就是十足的女性主義認識論 —— 是傳統，特別是實證主義的男性認識論無法「認識」的。根據 Smith 自己的說法：

> 女性的社會學 (Sociology for Women) ……不是一個集權（獨裁）(totalizing) 的理論。她反而是一個不斷開放、發掘問題、和追求新發現的探究方法……我的社會學從女人的經驗的現實性 (actuality) 開始（女性社會學的方法）從在我們學習之後當我們發現自己是生活在女性經驗中的能言說、思考、和明瞭的主體的那個地方 (site) 開始……正統的社會學扭曲並顛倒是非把我們（婦女）變成客體……在探索我們的經驗中發現我們的身體是受性別壓迫的場所 (site)……不論是形式或者焦點，女性受壓迫的經驗是植基在男性對我們身體的使用、控制和支配……我深信我所經驗和展示的女性立場是很特別的，同時我也試圖將她整理成一個社會學的研究法。這個方法的最大特徵是：女性的立場把研究放置（定位）在人們生活的實

> 際性 (actutality)，它從她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發端並貫穿到底地瞭解探究與其結果在 (in) 且是 (of) 同樣的生活實際性。(1992: 88–90)

Smith 一再強調女性社會學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研究法；她並且抨擊不論一位社會學家有多好的意圖，只要她／他採用了傳統的方法那麼結果就是把現實生活中的男尊女卑關係和父權的意識型態輸入到研究的文本 (text) 中了。[21] 再詳細一點的說女性社會學方法論有著以下的六個特徵：

①探討的主體／知者並非是一個超越的 (transcendent) 主體，而是座落 (situated) 在一個與他人有社會關係的日常生活現實性 (actuality) 中。

②這個研究法所談論的是真實 (actual) 個人的生活細節 (ongoing practices)。

③所謂女性的立場是把我們定位在在地的 (local)、真實的 (actual)、和特殊的(particular) 的身體位置 (sites)。

④社會研究和其成果是各種社會組織的形式。

⑤文本 (texts)，文本中介(text mediatien) 和文本性 (textuality) 是中心議題。

⑥文本中介的關係是現代社會中權力產生和擁有的不同形式。

總體而言，Smith 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了一個與傳統觀念迥異的社會學。這個她稱之為婦女社會學的最大特色在於它以女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女人立場）出發，並對主流社會學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作一個嚴厲的批判。一般社會學也有著抗爭或激進的傳統，[22] 但在 Smith 的眼裡他們並沒有真正改變現實生活中的約制關係 (relation of ruling) ——因為這個關係就編織在傳統社會學（特別是方法論）中。唯有女性社會學才有能力打破社會中的各種宰制關係。

在以上的兩個例子之後我們對婦女研究的方法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認

---

[21] 她同時也聲明這並不是質化社會學和量化社會學的爭論 (1992: 91)。Smith 說方法論非常重要，因為它是我們用來思考社會和其中關係的工具，偶而她用另一種表示的方法是「把社會寫進文本」。

[22] 這主要指的是反抗現狀 (status-quo) 或者左派 (leftist) 的社會學。一般（各種）馬克思和社會主義者均屬之。

識，但事實上方法論在太多時候與理論是無法區分的。特別是在婦女學的論述中許多要求都是環環相扣的。但是為了方便討論起見我們還是將方法論和知識論區分開來。在下一節裏我們要討論婦女學對於人類知識構建的貢獻。

婦女研究對社會學次領域的衝擊

在本節中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的釐清（或說明）婦女和兩性研究對社會學的實質影響。前面兩節有關婦女研究在理論和方法學的介紹不僅替我們在此處的論述奠定了一個基礎；而對於兩性研究對社會學中諸多次領域的衝擊也可以被視為是實際操作婦女研究的一個重要練習。此外，我也試圖在探討中加入一些比較婦女研究和其他知識論的異同。

就最深層的意義來講，婦女研究代表了一個企圖構建知識的嶄新嘗試。這個新並非表示婦女和兩性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反而是在使用傳統研究方法時，有女性意識的社會和人文科學家可以使一般的社會研究顧及了一般研究的盲點，把盲點改善，並使之更具人性。在許多人類社會裡不論是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知識觀為主流；因此客觀、理性、公正、無偏見、和測量成了最主要的科學構建的原則。實證主義者的科學觀除了強調經驗的重要性之外，並且也試圖建立能夠解釋所有現象的法則，因此在創造知識的動機上，可以說是「為控制而預測、為預測而瞭解！」(Martineau, 1896: 20–1)。實證主義者認為在科學中不能夠有個人的主觀性和價值存在；同時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也因為受過了專門的訓練而使得她／他們在說法上是可信的（被觀察者因為不具專業性，因而其說法是至少須存疑的。）又因為科學必須是藉著測量變數之間的關係而找出法則，所以不可測量的情境、意義等必須被工具化以利探討和比較。女性主義者 Chafetz 認為一個理論若能夠被用來挑戰、並對抗或改變不利或鄙視女人的既存（現有）社會制度，則該理論就可以被視為是女性主義的理論。詳細的說，她認為女性學具有以下的三個特點：一、性屬 (gender) 構成了理論的中心焦點；二、兩性關係被視為是有問題

的(problematic)；三、兩性關係並非自然或不可改變的。(1988: 5)

我們待會兒會對具有女性意識的科學構建觀作介紹。現在先讓我們以幾個具體的例子來檢視在女性學的理論構建會對社會學產生何種衝擊，以及女性主義所能夠提供的「替代性方案」(alternatives)。首先以工作的領域上來說：至少到本世紀中葉為止，工作社會學大體上是一個有強烈男性偏見的領域。不僅學者研究的對象是男性，而和工作環境、福利、工作場所的政治經濟學、勞資關係或勞工運動等有關的探討都集中在男性。這一方面說明了前面所提到的家務分工的不合理性；他方面也顯示了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總認為男性是「養家活口」的人 (bread winner)。在 1965 年 Rapoport 和 Rapoport 的研究中，開始質疑把工作和家庭視為兩個獨立社會體系的看法；可以被視為是一個關於工作研究新時代的開端。

自七十年代開始，我們漸漸地看到了關於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之後的探討。Horner (1970)、Lipman-Blumen (1972: 34–42)、Hughes (1973: 767–772)、和 Papanek (1973: 90–110) 提到了妻子幫助丈夫的事業而自己卻在貢獻中完全被忽視的故事，因此有所謂「兩人職業」(two person career) 和「脆弱的成就」(vacarious achievement) 等概念的提出。此外，研究者亦有文獻描述婦女就業的一般情況 (Blau, 1979: 265– 89; England and McCreary, 1987: 286–320)，而關於女性進入傳統上被認為是男性領域的工作，像是醫師 (Bourne and Wikler, 1978: 430– 40; Lorber, 1984; Bowman and Gross, 1986: 513–21) 或管理階級 (Kanter, 1977; Powell, 1988) 和上等階級的女人 (Ostrander, 1984)，社會人文科學家也有許多論述。整體而言，根據 Ferree 和 Hess (1987: 9) 的說法是：我們可以視 Millman 和 Kanter 所出版的《另一種聲音》(1975) 為女性主義者在社會科學界所從事革命的開始。

在現今的眼光來看，我們必須承認有女性意識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家的確對「工作」這一個重要研究課題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不僅我們目睹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女性快速、大量的投入勞動力市場；㉓ 更重要的

㉓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資料，婦女參與勞力市場的比率從 1945 年的 34% 提升到 1985 年的 55% 。而在 1985 年有 53% 有六歲以下兒童和 51% 有三歲以下幼兒的母親在勞

是，女性研究學者使我們體認了在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在量上激增的陰影裡，她們工作的所值（質）還是遠低於男性。換句話說，性別不平等還存在於生活的領域中，並且用一種更含蓄的方式來宰制女性。

婦女學的研究同時也發現了兩性之間的同工不同酬。女性集中在低收入、低聲望、有升遷瓶頸的服務業；低品質的勞工福利、在職訓練的缺乏和重覆單調的半技術職業類別裡，前面所提到的像是奧斯純德 (Ostrander, 1984) 和肯德 (Kanter, 1977) 的論述，我們也知道了在高階級的女性事實上也並沒有比其他女性得到更好的待遇。以後者的名著《公司裡的男性和女性》中來看，不論女性的地位，如果她是和一群男性互動的話，那麼她在性別 (sex) 上的特徵就特別突出、重要；而與她互動的男性也特別容易用性屬（gender）刻板印象來觀察她。這個研究說明了雖然有一些女性能夠擠進男性的世界（即管理階層）而成了「粉紅領階級」(pink collar)，但事實上她們必須以男性的方式在企業中運作（通常比男性更辛苦），而且她們還是會被男性的刻板印象對待。因此在高階或一般人認為男性領域中工作的女性就成了「樣版」(token)。

在以上所陳述的工作領域中，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在這半個世紀以來有了戲劇性轉變。雖然我們看到了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包括已婚／未婚，有孩童／無孩童）日益增多。但實際上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所受到的待遇是較次等的。又因為在傳統的觀念裏，工作是「男人的事」，因而使得婦女在勞動力的參與和增加，從表面上看來是有所改善，但婦女和兩性研究的學者卻可以極清楚而具體地指出在工作領域中的性別歧視。

在家庭／工作的二分被婦女學者打破了之後，女權意識高昂的科學家也把注意力轉移到了與兩者都有關係的日常生活領域的探討，㉔ 且伴隨

動市場中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85)。

㉔ 譬如像是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婚姻與家庭 (Bernard, 1973; Bridenthal, 1979: 189–95; Collier, Rosaldo and Yanagisako, 1982: 25–39; Glenn, 1987: 348–80; Kantor and Okun, 1989)、兩性的家務分工(Meissner, Humphery, Meiss and Scheu, 1975: 424–59; Glenn, 1980: 432–71; Hartmann, 1981: 366–94; Ferree, 1983:148–67)、女性的情慾和生殖 (Hite, 1976; Miller and Fowlkes, 1980: 783–800; Petchesky, 1980: 661–85; Delmater, 1981: 263–90; Caulfield, 1985: 343–63; Gallagher, 1985; Rothman , 1987: 154–70) 等探討。

著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學者也開始注意婦女的生活品質。在通盤的考量之下，一系列和工作、家庭有關的社會現象陸續地成為婦女學研究的主題。在此我們要描述一下關於婦女的貧窮研究。相對於最早期的探索 (Lewis, 1968: 187–220; Gordon, 1971; Thurow, 1975; Hurst, 1979) 而言，從八十年代的女性主義研究發現了貧窮人口的性別有漸往女性集中的現象，因此有了貧窮女性化理論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的出現(Pearce, 1978; Smith, 1986; Goldberg and Kremen, 1987: 3–14)。

簡單的說，「貧窮女性化」的理論闡釋了伴隨著日益增加的婦女參加勞動力市場，在舊有社會福利制度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忽視了這個因為勞動力市場的性別結構改變所產生的新現象。因此在勞動婦女的福祉被忽視的情況下，產生了一群有工作的貧窮女性人口。另一種稍有不同的說法則強調其實貧窮女性化只是藉著漸增的女性貧窮可見性 (visibility) 彰顯了古典貧窮研究方法的缺失。因此「貧窮女性化」並非意味著現在的婦女比以前貧窮或現在有比以前還多的貧窮婦女；反而是一種對於貧窮研究新的角度的提出。

與貧窮密切相關的該是婦女的社會福利研究，在這方面的學術討論相當廣泛，較晚近的研究包括了收入津貼補助研究文獻的介紹 (Barnow, 1987: 157–93)、大量的關於有依賴兒童的家庭補助 (AFDC) (Levy, 1979: 76–97; Bell, 1986; Enns, Flanagan and Bell, 1986; Orr, 1986,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1987) 以及一般性的福利政策探討 (Glazer, 1988; Cottingham and Ellwood, 1989; Berkowitz, 1991) 等等。

其實婦女研究除了工作、家庭、婚姻、貧窮和福利之外，也包含了許多各個生活領域的現象。像是性暴力、成人圖片、階層化、婦女和國家的關係等。以首兩者而言，有女性意識的研究者認為成人圖片在意識型態上將女性物化、性化、和商品化。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成人圖片有誘發對女性的性暴力 (Baron and Straus, 1984: 185–212; Koss and Leonard, 1984: 213–32; Sheffield, 1987: 171–89) 的可能。因此基於反對以暴力（包括強暴、毆打、恐嚇、輪暴、脅迫賣淫、亂倫、性濫用、和性騷擾）和強調生育的維護（墮胎權）方面，女性主義者在婦女解放運動中所爭取的維護個人

自由。有女權意識的婦女學者不但否認女人沒有性慾的迷思(DeBeauvoir, 1953)，反對男性以性暴力作為支配和控制女性的工具；更寬廣的看，這些研究都提醒了我們對於女性性慾的注意。這個部分的研究相當程度地挑戰了傳統由生理結構來區分男性和女性的方法。而性別的複雜性也說明了並非所有的女人都面臨完全同樣的問題。因此，學術上的研究不僅證實了絕大多數壓迫、剝削女人的人是男人，同時女性主義的研究也找到「女人壓迫女人」（或甚至女人壓迫男人）的可能性。這些都是構成一個完整具有史觀（見 214 頁）的女性研究所能提出的貢獻。

除了以上項目之外，婦女與兩性的科學家也探討勞工階級婦女的失業問題 (Barrett, 1976: 155–65; Lein, 1984; Rosen, 1987)。婦女為了先生的工作而遷徙，和所引發的調適、交友、工作和婚姻問題 (Sell, 1983: 299–311; Stokols, Schumaker and Martinez, 1983: 5–19; McCollum, 1990) 及第三世界裡婦女在家中所從事的生產勞動 (Singh and Kelles–Viitanen, 1987) 等等。總之，婦女研究不但觸及了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它更以一種不同的意識狀態挖掘了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問題。除了以上我們所舉的實際例子之外，婦女和兩性研究也對於知識的創造過程提供了一種具有不同意義的看法。

由於婦女和兩性研究是受婦女解放運動的思想和行動所激發的，這使得她有著明確的行動意味。又因為婦女運動主張在思想上自覺 (aware, consciousness raising)，所以也類似批判科學和它所標榜的求解放的認知取向。終極而言，婦女研究要求打破性別歧視、促進合理的性別分工、挑戰男尊女卑的意識型態，企圖在每一個生活領域裡改善人的認知、思想，和社會制度及政策，以要求完全的兩性平等。

因為婦女研究的以上特徵，使得在社會上一般習慣於傳統理論構建的人恐慌；又加上婦女學的短暫歷史和明顯的異質性，使得在學術界出現了一些「相對於婦女學而興起的」現象。除了明顯的反對婦女學之外，有些男性會因為受到婦女和兩性研究的影響而意識揚昇，建立了相對於婦女研究的男性研究 (Pleck, 1977: 417–27; Nichols, 1980; Spender, 1987)。也有性別系統、男性解放等領域的興起。而在男性的敵意、學生的不瞭解、行

政體系的缺乏支持、和婦女學界本身的缺乏共識，也使得婦女和兩性研究經歷了盛、衰不同的發展階段。

由盛的方面來看反女權的論說者指控女性學已然成了一個新的知識霸權 (Gill, 1993: 235; Lemert, 1992: 63; Connell, 1992: 84)；而女性學的支持者則強調女性學的「畛域化」(Stacy and Thorne, 1985: 306)。不論我們接受那一種觀點，事實上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也越來越看得見的）女性主義論述。根據 Wallace 的看法 (1989: 11–7) 女性主義者對於社會學理論有著四個貢獻：

①對既有理論的批判和評估；

②新概念和議題的發現；

③跨科技整合的連結；

④一個新社會學典範的創造。

也因此，女性學的確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一個嶄新的知識觀。

結　論

在一種很真實的意義上說，與我們的母親和姊姊們比較起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和以前不同的社會裡。這種不同除了科技的發達、大眾傳播媒體的貫穿、政治地理的改變、和更快速的變遷之外，更重要的是新思潮的出現。以二十世紀末的現在來講，女性思想和政治動員可能是造成我們有新思潮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在前面的敘述裡，我們理解了婦女和兩性研究產生的背景、經過的歷程、它對社會學理論的影響，和她的特色。本文認為就技術 (techniques) 的層面而言，婦女和兩性研究與一般傳統的社會學理論並無顯著的不同。這種類似於美國婦女與兩性研究者 Harding (1986, 1987: 1–14) 的論述立場，是不同於將婦女學認為在方法論上有獨特之處的諸學者 (Smith, 1979; Roberts, 1981; Klein, 1983)。但因為婦女研究有著它特別關心的性別不平等，而又允許非主流的研究方法，加上了它所具有的明顯價值觀和政策意涵，這使得它迥異於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

因為婦女和兩性研究是一個貫穿所有人類知識領域的探討範疇，這

使得它和尋常的學科不同。以社會學為例：從女性主義的社會學於 1969 年在舊金山成立女性會議團體和 1970 年正式成立女性主義社會學學會 (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 SWS) 以來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在這一段時間裡不僅有豐富的研究出現，更主要的是整個美國社會學界因之有較高昂的女性意識。雖然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大多出現在非主流的學刊，如：*Sex Roles, Feminist Studies, Gender and Society, Signs,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中，但現在我們偶而也會在主流的（三大或五大）學術性刊物中發現女性主義的論述。㉕

除了上面所舉的例子之外，學者也開始注意到學術界女性在教學和研究上所遇到的歧視 (McNamee, Willis and Rotchford, 1990: 99–115; Rong, Grant and Ward, 1989: 95–100; Long, Allison and McGinnis, 1993: 703–22)、婦女和少數族裔對美國社會學的貢獻 (TAS, vol.23, no.1)，和女性主義對古典社會學理論的批判(Johnson, 1989: 101–18; Meisenhelter, 1989: 119–32; England, 1989: 14–28; Bologh, 1987: 145–68) 等等。這些事實證明了女性主義的論述逐漸貫穿了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學知識論。除了新團體和學術性刊物的興起之外，最戲劇性的一幕莫過於 1994 年 7 月美國社會學學會第一次在三個最主要的位置上（會長、副會長、祕書）選出了女性的學者 (Footnote, Summer 1994, vol. 22, no. 6)。看到三個女人的照片並排出現在 Footnote 所報導的學會最高位置上，那種感覺是很愉快的。

但婦女和兩性研究的包容性並不侷限在它的方法論上，在研究者、研究對象、領域和各學科都可實施婦女學的研究法。周顏玲在她的一篇論文中 (1989: 29) 提出了婦女和性別研究的六個特色：

①此學科是社會及行為科學之學門 (specialized field)，是研究兩性生活體驗和關係特質，並不是從男女社會問題作重點入手。

②此學科是從婦女人生經驗、觀點為研究主體作出發點，以瞭解兩性

㉕ South and Spitze, 1994: 327–47; Presser, 1994: 348–64; Johnson, 1994: 122–35; Izraeli and Silman, 1994: 69–84; Treas, 1993: 723–34; Bielby and Bielby, 1992: 1241–67; Naples, 1991: 316–32; Blum and Vandewater, 1993: 285–300; Maume and Mullin, 1993: 533–46; Jarrett, 1994: 30–49 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各方面的社會現象，承認男女經驗之關聯性。所以性別研究是相關和包容性的學術 (relational and inclusive scholarship)。

③此學科常具有批判性 (critical perspective)。男女學者應對傳統思想作重新批判、整理、創新、和再創新。

④此學科之研究對象應包括不同種族、階級、國籍、年齡，和不同背景之婦女與男女兩性。

⑤此學科不單著重基本科學各方面理論的建立，還要著重它的實用性，以解決社會各方面的問題，爭取政治上之援助，以謀求改良社會政策措施，有助國家建設。

⑥此學科是屬世界性的，不是單為西方歐美學者所獨佔。男女不平等是世界各國普遍之現象和社會事實 (social fact)。故此研究具有比較各國的學術觀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周顏玲的看法展現了一種我國婦女學者對女性學的關注和省思，她亦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談到了另一個我國婦女和兩性研究的重要課題：本土化（周顏玲， 1986）。[26] 在其他方面，中國論壇雜誌社在民國 76 年舉辦過一場女性知識份子與臺灣發展研討會（中國論壇，第 23 卷第 11 期，民國 76 年 3 月 10 日）、周碧娥的婦女參政研究 (1986，1990)、婦女研究通訊第 25 期（1992 年 2 月）的婦研專論中所探討的婦女運動和兩性研究，以及臺大婦女研究室自 1985 年成立後所做的努力，都證明了婦女和兩性研究也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無怪胡幼慧會推測「在本土婦運者的殷切期盼及西方女性主義的學術浪潮推動下，加上當前婦女問題的社會注目，婦女研究極可能由極冷門演成顯學，而婦女研究學者亦可能搖身變成學界新貴」(1992: 7)。雖然這種看法稍嫌樂觀，但目前臺灣（和整個世界）的學術界開始注意女學則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在去年我們也目睹了日益蓬勃的婦女和兩性研究；在實務上 6 月和7

---

[26] 研究者所提的是一種舉例說明式的規範，以此文獻的時間（距今已十年）而言，周的觀點似已略嫌過時，而此十年之內國內有許多女性學者致力在兩性研究和女性意識的提昇。更重要的是此處的特點並沒有顧慮到眾多婦女間的世代、性偏好和種族等的差異。因此我國的相關研究已然展現了相當豐富的異質性風貌。

月分別有女性學學會和國民黨婦女工作會的婦女政策白皮書出現，㉗ 而婦女新知和晚晴協會版本的民法親屬篇也即將進入立法院二讀，臺大女研社也因放映成人電影而成為社會的焦點。在學界則有多次的研討會集中在婦女議題；㉘ 而文化和傳播界亦普遍針對婦女的議題加以探討，都說明了女性學興起的社會現象。

總之，做為一個新興和引人注目的探討領域，婦女與兩性研究顯示出她重要且獨特的性格。本論文試圖指出幾個相關的現象和議題，並在以社會學為探討對象的練習中討論了三個重要的問題：一、婦女研究在何種歷史和社會的脈絡中興起，而它又如何改造社會；二、婦女和兩性研究對社會學有何影響；三、婦女研究的方法論有何特色，以及它對社會學的次領域造成什麼衝擊。藉著針對上述問題的探討我們知道了它的異質性、批判性和包容性。此外由於從事這個方向研究的學者日益增多，而各種不同意見的陳述、表達（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婦女研究是否有其獨特的方法論）和爭論也可證明了這個領域的受到重視。因此，「一種新的知識構建企圖正在地平線昇起」的陳述不該是太誇張的陳述。藉著時間和更多人的努力，我們相信婦女和兩性研究會在知識論中爭取到它應該有的地位。

※作者感謝胡幼慧、徐宗國和兩位《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匿名評審所提供的批評和建議。

㉗ 女性學學會的研討會在 6 月 17 日舉辦，婦工會的則在 7 月 13 日。此外尚有內政部和民進黨婦展會的婦女處境白皮書接近完成。

㉘ 如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在 6 月所舉辦之「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研討會」中，呂玉瑕、孔祥明、陸先恆與胡美珍、胡幼慧、林松齡和 Tony Tam 的論文，以及近史所的「近代中國婦女史學術座談會」，其中呂玉瑕 (1995) 所發表的論文有關於社會學的兩性研究有相當詳細的文獻介紹。

參考書目

《中國論壇》，〈女性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23 卷11 期，1987 年 3 月 10 日。

孔祥明，1995 年，"The Effects of Gender, Marriage, and Family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Case of a Changing Society in Taiwan"，「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

林松齡，1995 年，〈婚姻權力的結構關係〉，「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

呂玉瑕，1995 年a，〈助力與阻力之間：家庭互動關係與已婚婦女就業〉，「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

——，1995 年 b，〈社會學中的婦女與兩性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學術座談會。

周碧娥，1986 年，〈台灣地區婦女參與選舉政治的程度及其影響因素：美國性別差距理論在台灣適用的初探〉，《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專輯》，2 號。

周顏玲，1986 年，社會學中國化與婦女社會學〈一〉，見蔡勇美、蕭新煌主編，《社會學中國化》，頁 105-133，台北：巨流出版社。

——，1989 年，〈婦女與性別研究的理論架構、方法及其中國化未來發展〉，《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 號，台北：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

胡幼慧，1985 年，〈變遷中的代際關係：女兒與媳婦角色的隱形化探討〉，「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

《婦女研究通訊》，第 25 期，台北：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

陸先恆與胡美珍，1995 年，〈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台灣已婚婦女就業機會與個人收入影響之研究〉，「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

Tam, T. 1995 年，"Getting Ahead in Taiwan: Does The Relative Standing of Parents Matter?"，「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

References

Barnow, B. 1987, "The Impact of CETA Program on Earning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2: 157–193.

Baron, L. and M. A. Strauss, 1984, "Sexual Stratification, Pornography and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N. M. Malamuth and E. Donnerstein, ed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Inc., pp. 185–212.

Barrett, N. S. 1976, "The Economy Ahead of Us: Will Women Have Different Roles?" in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A Look to the 1980s*, J. M. Kreps,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pp. 155–165.

Baudrillard, J. 1987, "Moder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1:3.

Bell, S. H. 1986, "AFDC Homemaker-Home Health Aid Demonstrations: Trainee Public Program Benefits," Report, Cambridge, MA: Abt Associates.

Berger, P. L. and T.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Penguin.

Berkowitz, E. D. 1991, *America's Welfare State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ernard, J. 1973, *The Future of Marriage*, New York: Bantam.

Bhavnani, K. K. and M. Coulson, 1994, "Transforming Socialist Feminism: the Challenge of Racism," in *The Woman Question*, 2nd ed. by M. Evans, ed., London: Sage, pp. 334–344.

Bielby, W. T. and D. D. Bielby, 1992, "Family Ties, Gender Roles, and Relocating for a Better Job," *AJS*, 97(5): 1241–1267.

Blau, F. D. 1979,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An Overview," in *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J. Freeman, ed., Palo Alto, CA: Mayfield Publishing Co., pp. 265–289.

Blum, L. M. and E. A. Vandewater, 1993, "'Mother to Mother': A Maternalist Organization in Late Capitalist America," *Social Problems*, 40(3): 285–300.

Bologh, R. W. 1987, "Marx, Weber, and Masculine Theorizing: A Feminist Analysis," in *The Marx-Weber Debate*, by N. Wiley,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45–168.

Bourne, P. G. and J. K. Wikler, 1978, "Commitment and the Cultural Mandate: Women in Medicine," *Social Problems*, 25: 430–440.

Bowman, M. and M. L. Gross, 1986,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Women in Medicine: Issues for Public Policy Makers," *Public Health Reports*, 101: 513–521.

Braidotti, R. 1992, "On the Feminist Female Subject or from She-Self to She-Other," in *Beyond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Citizenship, Feminist Politic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London: Routledge.

Braudel, F. 1981,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15th-18th Century: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v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 272.

Bridenthal, R. 1979, "Examining Family History: Family and Reproduction," *Feminist Studies*, 5: 189–195.

Bulmer, M.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al Resear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12.

Buss, A. R. 1978,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4: 57–64.

Cancian, F. M. 1992, "Feminist Science: Methodologies that Challenge Inequality," *Gender and Society*, 6(4): 623–642.

Caufield, M. D. 1985, "Sexuality in Human Evolution," *Feminist Studies*, 11: 343–363.

Chafetz, J. S. 1988, "Feminist Sociology: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Theories," Itasca, IL: F. E. Peacock, p. 5.

Chou, B. E., C. Clark and J. Clark, 1990, *Women in Taiwan Politics: Overcoming*

Barriers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Collier, J., M. Z. Rosaldo and S. Yanagisako, 1982, "Is There A Family? New Anthropological Views," in *Rethinking the Family: Some Feminist Questions,* B. Thorne and M. Yalom, eds., New York: Longman, pp. 25–39.

Colwill, N. L. 1978, "The Study of Sex Differenc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by H. M. Lips and N. L. Colwill, ed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Connell, R. W. 1992, "A Sober Anarchism," *Sociological Theory*, 10(1): 84.

Cottingham, P. H. and D. T. Ellwood, eds. 1989, *Welfare Policy for the 199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lmater, J. 1981, "The Social Control of Sexu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7: 263–290.

Duby, G. and M. Perrot, 1992, "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A History of Women*, P. S. Pantel,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 pp. ix-xx.

England, P. and L. McCreary, 1987, "Gender Inequality in Paid Employment," in *Analyzing Gender: A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 B. Hess and M. M. Ferree, e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286–320.

England, P. 1989, "A Feminist Critique of Rational-Choice Theories: Implications for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0(1): 14–28.

Enns, J. H., K. L. Flanagan, and S. H. Bell, 1986, "AFDC Homemaker-Home Health Aid Demonstrations: Trainee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Report, Cambridge, MA: Abt Associates.

Faith, K. 1994, "Resistance: Lessons from Foucault and Feminism," in *Power/Gender Social Rel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y H. L. Radtke and H. J. Stam, eds., London: Sage, pp. 36–66.

Ferree, M. M. 1987, "Equality and Autonomy: 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 in *The Women's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by M. F. Katzenstein and C. M. Mueller, ed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 173.

Ferree, M. M. and B. B. Hess, 1987, "Introduction," in *Analyzing Gender: A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 B. Hess and M. M. Ferree, e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 9.

Flax, J. 1990,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 in *Feminism/Postmodernism*, by L. Nicholson, ed., London: Routledge, pp. 39–62.

Fraser, N. 1989,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M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2, "The Uses and Abuses of French Discourse Theories for Feminist Politic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9(1): 51–71.

Gallagher, J. 1985, "Fetal Personhood and Women's Policy," in *Biology and Women's Policy*, E. Sapiro, ed., Newbury Park: Sage.

Gelb, J. 1987, "Social Movement 'Succ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Women's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by M. F. Katzenstein and C. M. Mueller, ed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 286.

Gerstein, D. B. 1976, "A Note on the Continuity of Parsonian Action Theory," *Sociological Inquiry*.

Gill, R. 1993, "Reading 'Psychology Constructs the Female' 25 Years On,"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3(2): 235–238.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lazer, N., 1988, *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leen, E. N. 1980, "The Dialectics of Wage Work: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and Domestic Services, 1905–1940," *Feminist Studies*, 6: 432–471.

Goldberg, G. S. and E. Kremen, 1987,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Only in America," *Social Policy*, 17: 3–14.

Gordon, D. M. 1971, *Problems in Political Economy: An Urban Perspective*,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 1987, "Gender and the Family," in *Analyzing Gender: A Handbook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 B. Hess and M. M. Ferree, e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348–380.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Harding, S.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of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7,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 Harding, ed.,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tmann, H. 1981, "The Family as a Locus of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Struggle: The Example of Housework," *Signs*, 6: 366–394.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Hite, S. 1976, *The Hite Report on Female Sexuality*, New York: Macmillan.

Honig, E. and G. Hershatter, 1988, *Personal Voci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ner, M. S. 1970, "Femininity and Successful Achievement: A Basic Inconsistency," in *Female Personality and Conflict*, J. M. Bardwick et. al., eds., Belmont, CA: Brooks/Cole.

Hughes, H. M. 1973, "Maid of All Work or Departmental Sister in Law? The Faculty Wife Employed on Campus," *AJS*, 78: 767–772.

Hurst, C. E. 1979, *The Anatomy of Social Inequality*, St. Louis: The C. V. Mosby Co..

Huyssen, A. 1986,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Izraeli, D. N. and N. Silman, 1994, "Money Matters: Spousal Income and Family/Work Relation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5(1): 69–84.

Jarrett, R. L. 1994, "Living Poor: Family Life Among Single Parent, African-

American Women," *Social Problems*, 41(1): 30–49.

Johnson, C. 1994, "Gender, 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Leader-Subordinate Conversations," *ASR*, 59(1): 122–135.

Johnson, M. M. 1989, "Feminism and th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in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by R. A. Wallace,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01–118.

Kanter, R. M. and M. Millman, 1975, *Another Voi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Anchor.

Kanter, R. M. 1977, *Ma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Kantor, D. and B. F. Okun, 1989, eds., *Intimate Environments: Sex, Intimacy, and Gender in Familie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Katzenstein, M. F. and C. M. Mueller, eds., 1987, *The Women's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 5.

Katzenstein, M. F. 1989, "Organizing Against Violence: Strategies of the Indian Women's Movement," *Pacific Affairs*, 62: 53–71.

Kaufmann-McCall, D. 1983, "Politics of Difference: The Women's Movement in France from May 1968 to Mitterrand,"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9: 282–293.

Kishwar, M. 1994, "A Horror of Isms," in *The Woman Question*, 2nd by M. Evans, ed. London: Sage, pp. 22–29.

Kitzinger, C. 1993, "Editor's Introduction: Revisioning Weisstein, Revitalizing Feminism,"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3(2): 189–193.

Klein, R. D. 1983, "How to Do What We Want to Do: Thoughts about Feminist Methodology," in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G. Bowles and R. Klein, eds.,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Koss, M. P. and K. E. Leonard, 1984, "Sexually Aggressive Men: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N. M. Malamuth and E. Donnerstein, ed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Inc., pp. 213–232.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in, L. 1984, *Family without Victim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Lemert, C. 1992, "Subjectivity's Limit: the Unsolved Riddle of the Standpoint," *Sociological Theory*, 10(1): 63.

Levy, F. 1979, "The Labor Supply of Female Heads, or AFDC Work Incentives Don't Work Too Wel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4: 76–97.

Lewis, O. 1968,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n *On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 D. P. Moynihan,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Lerner, G. 1979,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Women in Americ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

Lincoln, Y. S. and E. G. Guba,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ury Park, CA: Sage, p. 7.

Lipman-Blumen J. 1972, "How Ideology Shapes Women's Lives," *Scientific America*, 226(1): 34–42.

Long, J. S., P. D. Allison and R. McGinnis, 1993, "Sex Differences and Productivity in Academic Rank Advancement," *ASR*, 58(5): 703–722.

Lorber, J. 1984, *Women Physicians: Careers, Status & Power*, New York: Tavistock.

Lyotard, F. 1986,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rgolis, D. R., 1993, "Women's Movement Around the Worl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Gender and Society*, 7(3): 379–99

Martineau, H. 1896, trans. and condensed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e Comte*, London: Bell Co., pp. 20–21.

Maume, D. J. and K. R. Mullin, 1993, "Men's Participation in Child Care and Women's Work Attachment," *Social Problems*, 40(4): 533–546.

McCollum, A. T. 1990, *The Trauma of Moving: Psychological Issues for Women*, Newbury Park, CA: Sage.

McNamee, S. J., C. L. Willis and A. M. Rotchford, 1990, "Gender Difference in Patterns of Publication in Leading Sociology Journals, 1960–1985,"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s*, 21(2): 99–115.

Meisenhelder, T. 1989, "Habermas and Feminism: the Future of Critical Theory," in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by R. A. Wallace,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19–132.

Meissner, M., E. W. Humphery, S. M. Meiss and W. J. Scheu, 1975, "No Exit for Wives: Sexual Behavior of Labor and the Cumulation of Household Demand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12: 424–459.

Miller, P. Y. and M. R. Fowlkes, 1980, "Social and Behavior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exuality," *Signs*, 5: 783–800.

Naples, N. A. 1991, "Contradictions in the Gender Subtext of the War on Poverty: The Community Work and Resistance of Women from Low Income Communities," *Social Problems*, 38(3): 316–332.

Nichols, J. 1980, *Men's Liberation: A New Definition of Masculinity*, New York: Penguin.

Nicholson, L. ed. 1990,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Orr, L. L. 1986, "AFDC Homemakers-Home Health Aid Demonstrations: Benefits and Costs," Report, Cambridge, MA: Abt Associates.

Palley, M. L. 1991, "Women's Rights as Human Right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Annals*, 515: 163–178.

Papanek, H. 1973, "Men, Women, and Work: Reflections on the Two-Person Career," in *Changing Women in A Changing Society*, J. Huber,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90–110.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Pearce, D. M. 197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Women, Work, and Welfare," *Urban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 11: 28–36.

Petchesky, R. 1980, "Reproductive Freedom: Beyond A Woman's Right to Choose," *Signs*, 5: 661–685.

Peters, J. and A. Wolper, 1995,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Pharr, S. 1981, *Political Women in Japan*,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leck, J. H. 1977, "The Work-Family Role System," *Social Problems*, 24: 417–427.

Powell, G. N. 1988, *Women & Men in Management*, Newbury Park, CA: Sage.

Presser, H. B. 1994, "Employment Schedules, Gender, and Household Labor," *ASR*, 59(3): 348–364.

Rapoport, R. and R. Rapoport, 1965, "Work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SR*, 30: 381–394.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17.

Ritzer, G. 1975, *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Roberts, H. 1981,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ong, X. L., L. Grant and K. B. Ward, 1989, "Productivity of Women Scholars and Gender Researchers: Is Funding A Factor?"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s*, 20(1): 95–100.

Rosen, E. I. 1987, *Bitter Choices: Blue-Collar Women In and Out of 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thman, B. K. 1987, "Reproduction," in *Analyzing Gender: A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 B. Hess and M. M. Ferree, eds., Newbury Park: Sage, pp. 154–170.

Sell, R. R. 1983, "Analyzing Migration Decisions: The First Step-Whose Decisions?" *Demography*, 20(3): 299–311.

Sheffield, C. J. 1987, "Sexual Terrorism: The Social Control of Women," in *Analyzing Gender: A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 B. Hess and M. M. Ferree, e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71–189.

Shotter, J. 1978, "Toward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Everyday Life: A Standpoint ' in Action',"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ethod*, by M. Brenner, P. Marsh and

M. Brenner, 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33–43.

Singh, A. M. and A. Kelles-Viitanen, 1987, eds., *Invisible Hands: Women in Home-Based Production*, New Delhi: Sage.

Smith, D. E. 1979, "A Sociology of Women," in *The Prism of Sex: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J. Sherman and E. Beck, ed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 135–187.

——,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8–9.

——, 1990,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 of Ruling*, London: Routledge.

——, 1992, "Sociology from Women's Experience: A Reaffirm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0(1): 88–98.

Smith, J. 1986, "The Paradox of Women's Poverty: Wage-Earning Wome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Women and Poverty*, B. C. Gelpi et. al., eds.,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per, K, 1994, "Feminism, Huma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Woman Question*, by M. Evans, ed., London: Sage, pp. 10–21.

South, S. J. and G. Spitze, 1994, "Housework in Marital and Nonmarital Households," *ASR*, 59(3): 327–347.

Spender, D. 1987, ed., *Men's Studies Modified: 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the Academic Disciplines*, New York: Pergamon.

Stacey, J. and B. Thorne, 1985,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32(April): 301–316.

Stanley, L. and S. Wise, 1983, *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tokols, D., S. A. Shumaker and J. Martinez, 1983,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Personal Well-Be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 5–19.

Thomas, W. I. 1907, *Sex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ex*,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23, *The Unadjusted Girl*, Boston: Little, Brown Co..

Thomas, W. I. and F. Znaniecki, 1958, *The Polish Peasant*, 2 vols., New York: Dover.

Thurow, L. C. 1975, *Generating In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Treas, J. 1993, "Money in the Bank: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Marriage," *ASR*, 58(5): 723–734.

Turner, J. H. 1982,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3rd. ed.,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Tuttle, L. 1986, *Encyclopedia of Feminism*, London: Arrow Books.

Unger, R. 1993, "The Personal is Paradoxical: Feminists Construct Psychology,"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3(2): 212.

U. 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1987, *Work and Welfare: Current AFDC Work Programs and Implications for Federal Policie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lker, L. 1984,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New York: Springer.

Wallace, R. 1989, "Introduction," in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by R. Wallace,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7–19.

Wang, Y. K. 1992, "Rebel with A Cause: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in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Wartenberg, H. R. 1986, "Centers for Research on Women: New Structur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s, News and Knowledge*, Vol. 3.

Weisstein, N. 1971, "Psychology Constructs the Female; or, The Fantasy Life of the Male Psychologist (with Some attention to the Fantasies of His Friends), the Male Biologists and Male Anthropologists," *Journal of Social Education*, 35: 362–373.

——, 1993, "Power, Resistance and Science: A Call for a Revitalized Feminist Psychology,"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3(2): 239–245.